

# 钧窑概念的形成及其产品时代辨析\*

徐华烽

**内容提要** 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梳理可知,钧窑的概念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不同阶段的文献隐含着不尽一致的产品信息。民窑钧瓷,即钧窑的碗、盘等类天青釉色瓷器,大体始烧于金代中后期;官窑钧瓷(简称“官钧”)即花盆、盆托、出戟尊等类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生产年代则在明代早中期。从广义、狭义概念两方面来认识钧窑,有利于科学把握其产品面貌。

**关键词** 钧窑 陶瓷考古 手工业研究

钧窑被后世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sup>①</sup>,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烧制年代是目前中外陶瓷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推动了钧窑问题的研究<sup>②</sup>,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检视文献所载钧窑相关资料,可知钧窑概念有一个形成过程,不同时代的钧窑产品蕴含着不同的信息。本文拟以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探讨钧窑概念的演变过程,以期对钧窑的产品及时代作出科学判断。

## 一 钧窑概念的形成

迄今难以看到北宋以前明确记载钧窑的文献。金代赵秉文(1159—1232)有《汝窑酒樽》诗:“秘色创尊形,中泓贮绿醪,缩肩潜堰蜓,蟠腹泓青宁,巧琢晴岚古,圆瑳碧玉茨,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緘扃。”<sup>③</sup>汝瓷酒樽釉色“晴岚”,据学者研究,实际上是天青色<sup>④</sup>。赵秉文生活的金代中后期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已经停烧,汝州城内张公巷窑主要烧造青釉瓷器,该时期天青色釉瓷器的胎土很可能来自跟汝州一致的伏牛山东段,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57)的成果之一;本研究得到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四批课题“嵩山地区陶瓷手工业研究”(项目编号:Y2015-B)的资助。

① 秦大树:《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页15—25。

② 较为重要的文章包括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考古学研究》(三),页138—145,科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前揭秦大树:《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③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附补遗)》卷六,页84,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

④ 李民举较早关注此细节,见李民举:《元汝官窑问题之我见》,《鸿禧文物》1996年创刊号,页209。

即陶瓷原料相同的汝州、钧州接壤地带。天青色是早期钧釉瓷器最具特点的釉色<sup>41</sup>，赵秉文的诗很有可能描绘的是钧瓷。钧州东张镇至元二十三年(1286)碑载，赵秉文曾为东张镇德应侯柏灵翁题写匾额<sup>42</sup>，对钧州瓷业有一定认识的赵秉文不记钧窑，表明钧瓷当时还处于仿汝阶段，被认为是汝窑一类的产品。较早生产钧瓷的窑址位于今青龙河流域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一带，金代属汝州辖区。金代在青龙河流域设“黄道镇”，属于汝州府下辖镇<sup>43</sup>。另一个较早烧造钧瓷的野猪沟在金代也属于黄道镇<sup>44</sup>，故金代人将刘家门、野猪沟一带窑场所产瓷器亦称为“汝瓷”<sup>45</sup>。

目前所见关于钧州窑业最早的文献为《元典章》“磁窑二八抽分”条，称：“至元五年(1268)七月初五日，制国用使司：来申，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sup>46</sup>，记载了元早期钧州窑业的税制<sup>47</sup>。至元二十三年(1286)《张左己碑》详细记载了钧州东张镇的瓷业生产状况，所涉税制与《元典章》正相对应，并称所产器是“百家之用所物”<sup>48</sup>。及至明代初年，系统记录瓷器的著作《格古要论》<sup>49</sup>和《碎金》<sup>10</sup>都没有提及钧窑。明正德、万历《大明会典》中则有宣德时期钧州瓷器贡御的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sup>11</sup>可见明代早期开始

〈1〉 目前已知关于钧釉瓷器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清乾隆年间唐英《陶成即事碑》及相关文献，主要指清雍正、乾隆年间景德镇仿钧的多种高温窑变色釉瓷器。20世纪80年代编著的《中国陶瓷史》中“钧釉瓷器”被用作专指钧窑的代表性产品，即今天常说的钧瓷。本文沿用这个约定成俗的称谓，以与钧窑的其他产品有所区别。

〈2〉 张左己撰碑记载：“有本镇德应侯柏灵翁之庙圣之像，乃司土工之神也。顾兹殿宇严肃，积有年矣，闲闲公书额在焉。”见王琴林主撰、孙彦春校注：民国版《禹县志》卷三《山志》，页170—171，据民国二十六年《禹县志》校注重排，中州古籍出版社。

〈3〉 《金史》卷二五《地理中》载：“汝州，上，刺史。宋临汝郡陆海军度使，国初为刺郡，贞祐三年八月升为防御。户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县四、镇三：梁(……正隆六年，敕环汝州百五十里内州县商贾，赴温汤置市)。郟城(宋隶许州。有汝水、扈涧河)。镇一(黄道)。鲁山(有尧山、口水、鸦河)。宝丰(有豢龙城)。镇一(汝南)”。见(元)脱脱等：《金史》页594，中华书局，1975年。

〈4〉 陈万里：《禹州之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2期。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之《异军突起之钧瓷》一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

〈5〉 李民举：《刘家窑与明昌样(二)》，《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6〉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户部卷之八《典章二十二》“洞冶”、“磁窑二八抽分”条，页895—896，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7〉 此文的“均州”应为“钧州”的避明神宗朱翊钧之讳的写法。清代道光《禹州志》较早关注这个避讳，称“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其时钧窑既不可改称禹窑，则避书做均”。参见(清)朱炜修，孙彦春校注：《清道光禹州志校注》卷二五《识余》，页702—703，据《禹州志》清道光十五年刊本为底本、同治九年续刻本为对脚本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8〉 前揭民国版《禹县志》卷三《山志》。

〈9〉 《格古要论》记13个古窑，后王佐增补3个古窑，共16个古窑，几乎囊括了宋元以来所有重要窑口，但唯独没有提及钧窑。见(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以《惜阴轩丛书》为底本重排，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10〉 (明)佚名《碎金》之《家生篇》“瓷器”条记：“甌子、建盏、定器、饶、汝窑、青器、官窑、耀器、缸、瓮、瓶、掇扳、鬲、砂钵、砂盆、水罐”，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本，1935年。此书余嘉锡先生跋其为明永乐初年据洪武后期旧版修改而成，这种小学课本从宋代就开始编撰，因此这些名称代表了宋元时期最常用的瓷器种类称谓。

〈11〉 (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之一九四，页980—981，据196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万历重修《明会典》缩印，中华书局，1989年。(明)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五七《工部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页618、542。

钧州窑场的缸、坛、盆等产品已经贡御，但未说明是何种釉色的瓷器。

钧窑之名长期被认为始于明代吴中、吕震奉敕编《宣德鼎彝谱》，该书被考证是一部后人托吕震之名的伪书，非宣德时所著，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明嘉靖时期，甚至不早于明天启丙寅年(1626)<sup>11</sup>。宋诩《宋氏家规部》卷四“窑类”条在介绍了柴窑、汝窑、官窑等十三个窑之后，接着记：“钧州窑，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色者，质甚厚。”<sup>12</sup>宋诩活跃于明代弘治年间，所著《宋氏家规部》的年代大致在明中期，行文上钧州窑虽排名较后，但第一次明确记载了钧州窑瓷器是天青色紫色、高温铜红釉窑变的釉色，这是花盆、盆托、出戟尊等类官窑钧瓷，即今人所谓“官钧”的主要特色<sup>13</sup>。

陆深《俨山集》也较早记载了钧州窑产品，他在《书·京中家二十三首》中记：“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晚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作一圆架座，朱红漆，前寄回银砂两包，此出涪州，俱是辰砂研成，只宜入漆，不可杂用了，知之知之。钧州葵花水盂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余不再收可也。”<sup>14</sup>据前后书信所记时事，讲到本年钦点状元是茅瓚，知此信写于嘉靖十七年(1538)<sup>15</sup>。书中提到“钧州缸”、“钧州葵花水盂”、“菱花水底”，从器形及用途来看，应是钧窑花盆、盆托等官窑钧瓷花器<sup>16</sup>。从中也知钧州花器在当时已被作为古董收藏，其生产年代远离陆深生活的嘉靖时期。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嘉靖钧州志》称，“瓷窑(笔者注：钧窑)在州西大刘山之下”<sup>17</sup>。

明万历以后有关钧州窑的著述渐多，大体可归为三类<sup>18</sup>。第一类对钧窑评价不高，以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的《遵生八笺》为代表。该书《燕闲清赏笺》论及瓷器分四小节<sup>19</sup>，第三节“论诸品窑器”最后才介绍均州窑。书中较早描述钧窑的釉色特征称：“若均州窑，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

11 刘静敏：《〈宣德鼎彝图谱〉之探讨》，《历史文物》双月刊总第41期，1996年。李民举：《元汝官窑问题之我见》，《鸿禧文物》1996年创刊号，页210、213。前揭《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前揭《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2 (明)宋诩：《宋氏家规部》页5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1子部杂家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13 按器形，余佩瑾将钧窑墓葬、窖藏与窑址出土的碗、盘、洗、炉、瓶、罐、瓷枕等定义为“器皿类钧瓷”，将作为花器用途传世的出戟尊、鼓钉洗、渣斗式花盆、仰钟式花盆、莲花式花盆、海棠式花盆、葵花式花盆与同形盆托(底部多半有一至十的数目字)，视为“陈设类钧瓷”。考古资料表明，前者主要是钧窑民窑产品，后者是产自钧台窑的官窑产品，西方学者称之为“NUMBERED CHUN WARE”，近代人俗称为“官钧”。见余佩瑾：《钧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故宫收藏的钧窑瓷器谈起》，余佩瑾主编：《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页6—27，台湾“故宫博物院”，1999年。

14 (明)陆深：《俨山集》卷九八“书·京中家书二十三首”，页63，载《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5 何新所：《钧瓷历史文献辑注》页6，学苑出版社，2012年。

16 引北京大学秦大树授课资料：朝鲜开城遗址曾出土一件白釉折沿斜直腹平底盆，具有明显的元明风格，盆底见墨书“缸”等字，可知当时称今天的盆为“缸”。

17 (明)谢濂编纂，唐群喜主编：《明嘉靖钧州志点注》页174，据天一阁藏《嘉靖钧州志》点注附影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18 秦大树将其分为两类三条，并分析了这些文献的来龙去脉，笔者归为三条，以为更易理解。秦文见前揭《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9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一四《燕闲清赏笺上》，页47，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册871，页713—714，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变露者为上品”，此外高濂还提及了瓷器的器形、胎质等。高濂的记载影响甚远，以致其他明清文人提到钧州窑必提及朱砂红、葱翠青、茄皮紫，并以此三种釉色为贵，这也是钧窑官窑花盆、盆托、出戟尊等花器的常见釉色。第二类对钧州窑持肯定态度，以张应文著于明万历前期的《清秘藏》为代表。该书卷上载：“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下有龙泉窑。”<sup>1</sup>将钧州窑列于宋五窑之后的第一位，描述亦中肯。第三类评价也不高，以明万历黄一正《事物纪原》所记“均窑器大，稍具诸色，光彩太露”<sup>2</sup>为代表，指的可能是钧州产白地黑花和白地黑花加褐彩、红绿彩等其他瓷器<sup>3</sup>，并非钧釉瓷器。

明代后期文献记载钧州窑渐多，表明其产品正日益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曾任明礼部尚书的董其昌《筠轩清閤录》中称，“均州窑之不有龙泉窑古”<sup>4</sup>。可见明万历前后对钧州窑权威的说法是它晚于龙泉窑。龙泉窑南宋末年开始为人所重，钧州窑的时代要晚于南宋，即元及明<sup>5</sup>。此外，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谈到钧釉花器后，还称，“其它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器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此处所论“坐墩、炉、盒、方瓶、罐子”，说明钧州窑烧造钧釉花器的同时，还生产白地黑花、白釉类瓷器<sup>6</sup>。

明代嘉靖、万历甚至天启时期，托吴中、吕震奉敕所编的《宣德鼎彝谱》记：“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检选，依原样勒限铸成。”<sup>7</sup>与先前文献不同，编者破天荒地将钧窑排在定窑之前，与其他宋代名窑并列，即“柴汝官哥均定”，表明钧州窑地位开始提高。清初文人承袭《宣德鼎彝谱》的排名，开始将钧州窑附会为宋代制品。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四“窑器”条称：“窑器所传柴汝官哥均定可勿论矣”，将钧窑与其他名窑并列，并录《高江村酬苍林宋钧窑瓶歌》：“僧僚偶见双耳瓶，黛色浓淡光冷冷，异哉均州旧时造。”注曰：“宣和间内府尚古器，搜求民间无敢隐者。”<sup>8</sup>至此，钧窑瓷器变为北宋宣和内府器。

清乾隆年间，“钧窑”之名正式出现，被认为是北宋制品，甚至北宋官窑。约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中记：“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奩、水底、花盆器皿。颜色火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雅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蒨肥厚，光

1. (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册872。

2. (明)黄一正：《事物纪原》卷二二，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类书类，齐鲁书社，1995年。

3. 前揭《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郭学雷：《再论“官钧”瓷器的年代》，《文物天地》2014年第4期，页22—31。

4. (明)董其昌：《筠轩清閤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

5. 前揭《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

6. 前揭《再论“官钧”瓷器的年代》。

7. (明)吕震等奉敕编次：《宣德鼎彝谱》页296，中国书店据《四库全书》本重排本，1996年。

8. (清)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四，页191，《文渊阁四库全书》87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彩夺目。”<sup>11</sup>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称：“均窑，亦宋初所造，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毫丝。红若胭脂朱砂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者次之，三者色纯无少变者为上。”<sup>12</sup>不但指出钧窑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为北宋，更点名其为宋初所造。

晚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和陈浏《陶雅》对钧窑更为推崇。《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已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称小窑。”<sup>13</sup>陈浏《陶雅》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龙泉、曰建”<sup>14</sup>，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陈浏是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的唯一者。晚清民国时文献中钧窑地位陡增主要是因为其在古玩市场上价值的提升。陈浏曾说：“余初著书时，宋钧且不见重于西商。今则宋元瓷器声价陡增，然犹必沾沾于紫釉，犹未得天青之三昧也。”<sup>15</sup>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光绪初年，乐亭刘氏极豪奢，伺猫犬饭盆，悉用钧瓷，取其质厚不易损，海王村商人以贱值得之者。彼时内府均窑花盆内亦不过种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绝无宝贵意。曾不二十年，以欧人最重此瓷，腾涨至万金以上，谈者云更二十年，均窑恐将绝迹国中矣。”<sup>16</sup>钧瓷的称谓这时已出现。

至于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最早由谁提出，已难于考证。1951年陈万里称“汝窑为宋代四大名窑之一”<sup>17</sup>，而不称钧窑为名窑<sup>18</sup>。1958年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指出当时已有人“将钧窑与定、汝、官、哥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sup>19</sup>。可知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包括钧窑在内的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已经出炉。其大体思路是沿袭前人所说的“柴汝官哥定”五窑，在将不见实物存世的柴窑排除后，被视为北宋官窑的钧窑在与龙泉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递补入五大名窑之列<sup>20</sup>。

综上，钧窑概念形成的主要脉络是，元代早期始有“钧州”窑业记载，钧州窑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弘治年间，明嘉靖之后“钧州窑”记载渐多，暗示其地位逐步提高。明万历之后避明神宗朱翊钧之讳被记为“均州窑”。明代后期的《宣德鼎彝谱》提出“柴汝官哥均定”，应是钧州窑成为名窑的源头。清乾隆年间出现钧窑之名，被说成是“官窑”，有了其始于北宋的说法，嘉庆年间被认为是“出钧台”，“宋初所造”。晚清以后钧窑被列入宋代名窑，直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宋代五大名窑说法的最终形成而跻身其列。

11 (清)佚名：《南窑笔记》，《艺术丛编》第一集册33页315，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

12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影印同治刊本，中国书店，1991年。

13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邓宝辑《美术丛刊》三集第六辑。

14 (清)寂园叟：《陶雅》卷上，影印书贵山房重刊本，中国书店，1991年。

15 前揭《陶雅》卷上。

16 黄睿：《花随人圣庵摭忆》页37，中华书局，2013年。

17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

18 前揭《禹州之行》。

19 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页25—26。

20 李辉柄：《钧窑的性质及其创烧年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页55—58。

## 二 钧窑的产品及时代

除了以上资料，钧窑文献又隐含着其产品时代的信息，其中有三条较为清晰的线索。一是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钧州建立、明万历三年(1575)钧州避讳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80)禹州城内建设“古钧台”，这三个时间节点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钧窑的概念、产地、时代的阶段性认识<sup>1</sup>。也就是说，金大定之后钧州设立才有钧州窑之名，明万历之后被称作“均窑”，清康熙之后钧窑被认为产自钧台。二是明代中后期人们提及钧州窑“胭脂红”、“葱翠青”、“茄皮紫”等釉色瓷器时并未标明其年代，表明钧州窑的花盆、盆托、出戟尊等官窑花器很可能就是明代中后期的产品，至少距此不远。清代文人对明代文献的传抄导致了钧窑年代为北宋的说法，进而为北宋官窑的不合实际论调，伪托之作《宣德鼎彝谱》很可能是始作俑者。晚清至民国收藏家和古玩商人对钧窑的追捧和官窑性质的认定，最终促进钧窑跻身宋代五大名窑之列。三是明清至民国时期，随着钧州生产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知名度的提高而逐步形成钧窑概念，所指品种曾经包括钧窑的白底黑花、白釉产品和民窑钧瓷，后来逐渐形成了今人理解的以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为钧瓷概念<sup>2</sup>。在钧窑概念形成过程中，明代以前钧窑碗、盘、瓶、罐等民窑天青类釉色瓷器未受重视，可能长期被视为汝瓷、青瓷。至迟在明代早中期，生产出花盆、盆托、出戟尊等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贡御”，在宫廷用来种植菖蒲<sup>3</sup>，钧窑声名鹊起，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被认为是钧窑的特色产品。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在景德镇御窑厂有组织地仿烧钧釉花器，用作宫廷种植菖蒲之外的水仙、茶花，乃至奇石盆景<sup>4</sup>。清末以后钧窑花盆、盆托等花器被古董商追捧，碗、盘类民窑钧瓷才渐入人们的视野。

对考古材料的全面分析可为钧窑时代的判断提供较为充分的依据。1974年钧台窑发掘分期主要依据明清文献记载的北宋钧官窑<sup>5</sup>，断代既无考古地层依据，又没有与明确纪年墓葬出土瓷器排比，早已受到质疑。2004年禹州钧台窑范围内原八卦洞附近的制药厂古钧花苑工地发掘出土一批带数目字的钧窑花盆、盆托、出戟尊等花器和碗、盘标本，均为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在元末明初<sup>6</sup>。一批学者以这批新资料为基础，得出“官钧”烧造于明早中期的结论<sup>7</sup>。2001年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反映了钧窑各个时期青釉、钧釉、白地黑花瓷器的生产面貌及其阶段性变化，发掘者将钧窑分为三期五段，分别对应于

〈1〉 徐华烽：《再议钧台、钧州与钧窑》，《中原文物》2016年第4期，页60—64。

〈2〉 李民举：《论早期钧瓷的“标准器”》，《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页24—26。前揭郭学雷：《再论“官钧”瓷器的年代》。

〈3〉 郭学雷：《官钧花器用途考》，《故宫文物月刊》2014年11月第380期，页3—13。

〈4〉 陈玉秀主编：《瓶盆风华：明清花器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页50、51、56、57、60—63。

〈5〉 赵青云：《河南省禹县钧台窑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赵青云：《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中原文物》1981特刊。赵青云《禹州钧台窑的烧造历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6〉 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前揭《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44—50。

〈7〉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页162—175，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前揭《再论“官钧”瓷器的年代》。

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晚期、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sup>1</sup>。并认为北宋末期为钧瓷的创烧时代<sup>2</sup>。但学术界对钧瓷创烧于北宋末期的判断未形成一致意见。最近，有学者重新解读2001年刘家门钧窑遗址早期地层出土资料，否定以铜钱作为断代依据，将出土钧釉瓷器与整个北方其他窑址、墓葬出土瓷器资料排队分析，得出刘家门早期地层的年代为金代中后期的结论<sup>3</sup>。2011年禹州鸠山镇闵庄钧窑发掘资料分为北宋后期、北宋末期至金代初年、金代中后期、元前期、元代中后期至明初等五个时期，大体代表了钧窑产生、成长、崛起、发展、繁荣五个阶段，其中天青釉钧瓷最早出现在金代中后期，元代早期发展较快，到明初达到生产高峰，出现的一批里蓝外红釉色的碗类器物标本标志着高温铜红釉技术渐趋成熟。闵庄钧窑考古的年代学分期结论除依靠地层学、类型学资料与绝对纪年瓷器排比之外，还对地层中出土的人类、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与考古年代学分期一致，其中最早出现钧瓷的遗迹单位出土人骨的碳十四数据树轮校正后年代为公元1155—1215年，当金代中后期<sup>4</sup>。结合1974年、2004年钧台窑发掘和2011年闵庄窑发掘、2013年神垕镇区窑址发掘资料<sup>5</sup>，可以看到北宋后期禹州有稍早的烧造精细化化妆白瓷和临汝窑青瓷的窑场，金元时期禹州钧窑发展很快，除钧釉外，还烧造青釉、黑釉、白釉（化妆白瓷）。明代早中期禹州在州治钧台窑和神垕镇区窑场都有很大规模的瓷器烧造。钧台窑在永乐、宣德至成化年间主要烧造高温铜红釉类花盆、盆托、出戟尊等花器和少量外红釉内蓝釉碗、盘钧瓷，神垕镇区窑场宣德至嘉靖年间主要烧造白地黑花类缸、坛、瓶瓷器，两处窑场的产品主要用于贡御<sup>6</sup>。此外，窑址调查和新近发现的碑刻资料表明，明代后期至清代早期，禹州的瓷业生产并未完全中断，而是保持着小规模生产<sup>7</sup>。这样，可以基本勾勒出今禹州市作为钧窑中心烧造区的陶瓷手工业从北宋后期至明代中后期产生、发展、衰弱的脉络，其中以天青釉为特色的民窑钧瓷的创烧应在金代中后期，在忽必烈控制河南的元代早期出现一个短时期的兴盛，明代早中期以成熟的高温铜红釉窑变为特征的花盆、盆托、出戟尊等官窑钧瓷花器达到生产顶峰。另一方面，以禹州、汝州等河南中西部窑场为主要产地，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及北京等地的墓葬、窖藏、遗址中发现一批“日用类钧瓷”，经研究可知早期钧瓷创烧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金世宗大定

1、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页26—52。

2、秦大树：《钧窑始烧年代考》，《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页75—94。

3、李民举：《刘家窑与“明昌样”（一）》，《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李民举：《刘家窑与“明昌样”（二）》，《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徐华烽：《金代中后期的钧窑瓷器——基于河南禹州闵庄钧窑作坊AT6F2出土资料的讨论》，史宁昌、苗建民主编：《宋代五大名窑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301—314，科学出版社，2016年。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台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李辉：《河南禹州神垕镇宋元窑址》，《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3日。

6、前揭《明代宫廷陶瓷史》。

7、据调查，距禹州闵庄窑东南约5公里碗药山出产釉石，粉碎后可以直接做原始釉料。位于山顶的石构山神庙东侧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公买李氏碗药山竖碑垂后》碑载，碗药山“买价钱玖拾叁千文，每年行粮实银贰分……得稞利按钱数均分”，说明当时碗药山的开采权以承包交费的形式被出让，用作瓷器生产原料来源地。

(1161—1189)至金章宗泰和(1201—1208)年间<sup>①</sup>。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北京、内蒙古等地墓葬、窖藏出土纪年钧瓷的年代集中在元代早、中期，即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期，这正是钧瓷烧造技术以禹州为中心向北方各地快速传播的时期。

陶瓷窑址考古资料反映的钧窑年代学分期和各地墓葬、窖藏、城址等出土的钧窑纪年资料，与元明时期文献记载的钧窑变迁状况逐渐趋于一致，表明我们对钧窑产品时代的认识正接近历史发展的面貌。

### 三 结语

钧窑，一般指古代钧州境内的窑场，也指钧窑生产的瓷器产品。然而，钧窑的概念和所指的产品经过长期的迁延流传，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涵：一是北宋以前不见钧窑的明确记载，金元时期始有零星记载，表明金元时期钧窑知名度不高。从窑址和各类遗址出土的钧瓷来看，早期钧瓷“钧汝不分”的仿汝瓷特征是钧窑民窑产品被记作“汝窑”产品的直接原因。二是明代中期出现了“钧州窑”的记载，代表性产品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胭脂红”、“葱翠青”、“茄皮紫”釉色，这可与今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带数目字的各式配套花盆、盆托及出戟尊之类的花器——产自今禹州城内八卦洞(钧台窑)用作“贡御”的所谓“官钧”瓷器相对应，其年代应为明代早中期。文献与考古资料也表明该时期钧窑除生产钧瓷外，也生产器大、质粗的白釉、白地黑花类瓷器。三是明代后期至清初“钧窑”概念正式形成，其盛名来自钧瓷官窑产品地位的提高。钧窑因避讳记作“均州窑”、“均窑”，仍多指花盆、盆托、出戟尊等高温铜红釉花器。四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钧州窑”、“钧窑”或“钧瓷”，包括了官窑钧瓷高温铜红釉窑变花器和民窑钧瓷天青釉碗、盘类产品，钧窑因其收藏价值而跻身很晚形成的“宋代五大名窑”之列。五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禹州市神垕镇为中心，从仿制官窑钧瓷花器开始，生产出以高温铜红釉窑变为特色的陈设瓷器和日用瓷器，使现代“钧瓷”成为“钧窑瓷器”、“钧釉瓷器”的简称或代名词。目前人们通常把钧窑所指产品，限定为天青色乳浊釉带红色窑变，发展为高温铜红釉窑变为特色的钧釉瓷器。

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陶瓷考古的发展，在古代钧州以外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甚至南方的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都发现了生产天青色乳浊釉、铜红釉窑变瓷器的窑场。钧窑的概念变得或大或小，大到北方地区生产钧瓷的数百个窑场，小者则局限在禹州境内生产钧瓷的窑场。因此，为避免认识上的混乱并便于学术的准确表达，应以狭义、广义概念来科学地认识钧窑及其产品。狭义的钧窑指在古代钧州范围内的陶瓷窑场，其代表性产品是风格独特的钧釉瓷器。广义的钧窑指生产钧釉瓷器的一批窑场，在河南中西部以至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都有分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

① 郭学雷：《钧瓷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八华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49—238，故宫出版社，2016年。